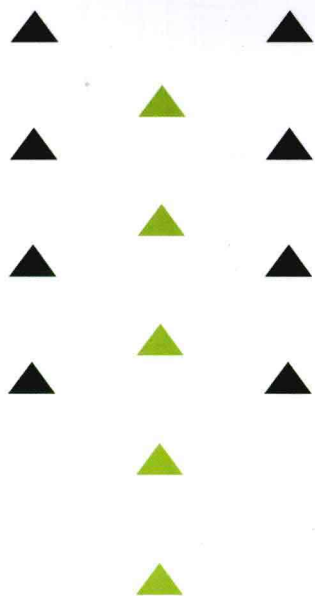




真的探索者·善的实践者·美的传播者

思想的原野

上册

著名学者、国防大学教授

公方彬 著

一直奔跑于思想原野的智者，在此放飞思想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真的探索者·善的实践者·美的传播者

思想的原野

·上册·

著名学者、国防大学教授

公方彬 著

广东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想的原野 / 公方彬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218-08474-9

I. ①思… II. ①公… III. ①军队政治工作—研究—中国 IV. ①E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10958号

SIXIANG DE YUANYE

思想的原野

公方彬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曾莹

策 划: 卢家明

责任编辑: 肖风华 李绮文

封面设计: 么介

责任技编: 周杰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邮政编码: 510102)

电 话: (020) 83798714(总编室)

传 真: (020) 83780199

网 址: <http://www.gdpph.com>

印 刷: 广州佳达彩印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18-08474-9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46.25 插 页: 2 字 数: 530千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88.00元(上下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0604 83791487 邮购: (020) 83781421

我们敬仰思想

自序一

讲伟大，每个人都可以开列出许多。社会中有伟大，伟大的母爱、伟大的牺牲……自然界也有伟大，自然力量之伟大，自然造化之伟大……自然界之伟大在突出奇崛，社会存在之伟大在常人所不及，常势所不至。如果我们再在伟大前面加上一个“最”字，问题或许就不那么简单，至少难以轻易作出回答。

以不同价值标准判断，结论有所不同，因此最伟大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命题。尽管如此，笔者仍然依照自己的价值判断给出答案：思想最伟大！对于这样的结论，相信应者众，至少大多数人不会轻易否定。这不仅因为我们经常为伟大的思想所感动，更因为对自然、社会和灵魂的关注皆源于思想，或最终都要通过思想。离开了思想，人类或许成为被抽空的皮囊。追根溯源，思想这一概念就来自佛教，即便不作这样的追溯，也还是可以认定，惟通过思想有希望弄清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诸如此类的基本的也是终极的命题，进而获得精神归宿。

看一下人类发展史，所以由蒙昧步入文明，拥有了更强的认识世界的能力，根源于思想家的思想指引。比如上个世纪的激情燃烧，就根源于马克思主义。如

果追溯至人类进入城市文明，更是奠基于一大批思想家及其伟大思想的产生。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就把公元前8世纪至2世纪称作人类文明的“轴心期”，因为这个时期产生了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印度的释迦牟尼，中国的老子、孔子等一批思想的巨人。恩格斯评价，他们几乎思考了人类所有的根本问题，并且得出初步结论。如果没有了这些思想巨人，人类文明史将暗淡很多。

即使仅仅从关注灵魂世界的角度讲，我们所以能够认识自己，也是得益于思想家的引领和启发。康德有一句名言：“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经常、越是执著地思考它们，心中越是充满永远新鲜、有增无减的赞叹和敬畏——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我们心中的道德法则。”这样的感知力显然非自然产生，一定是思想家们的指引和启发。有了思想家为我们开拓的认知力与精神空间，我们才会偶尔为伟大所感染和感动。比如，当我们来到罗马的梵蒂冈，驻足于签字大厅拉斐尔的《圣礼之争》、《雅典学园》、《三大德性》、《帕纳巴斯山》四幅巨作前，就能够对神学、哲学、法学、诗学产生更深刻的理解，甚至产生灵魂深处的强烈震撼。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对思想家及其思想的敬仰，就是缘于他们让我们的精神世界由有限而无限？不全是。其实，这种敬仰很大程度上源自我们对思想家及其思想的畏惧。为什么？因为思想家的思想走得太快、太远，以至常人无法跟进，这在客观上构成了落差，进而打破了社会既有的平静与平衡，打破了我们精神世界的平静与平衡，造成精神紧张甚至是威胁感。哪怕后来我们都成为思想家之思想的受益者。这类似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打破铁饭碗带来的是效率，由此而让我们享有了更加丰富的物质生活，但改革之初每个人感受到的却是压力，是威胁，因此更多排斥。至于社会管理者所以对思想家及其思想一开始多采取排斥态度甚至打压，除个别人、事件源于某些人的好恶与私利作祟之外，大多情况下是社会运行规律使然。大众在社会中存在于三种状态：先行者、落伍者、守中道不逾矩者，社会管理者虽明白先行者之伟大，但基于功利和维持社会稳定与平衡，往往出手打击走得过快的人。比如，古希腊的大思想家苏格拉底是被公民法庭判处死

刑的，后来民众省悟了，发现自己杀了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于是又把告苏格拉底的人也判了死刑。这是否意味着人类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不会，仍然要杀掉一个个走在最前面的人。所以思想家往往意味着悲剧，盖其中之原因——社会规律使然。

既然人们都不愿意受到威胁，因此排斥思想家及其思想，为什么最终又敬仰且张扬呢？这就涉及一个更深层次的规律。大凡称得上思想者，其境界必然高远，必然适度脱离现实功利，并且需要强烈的自我牺牲精神，非此不足以支撑伟大思想的产生。特别是，思想家的思想在一个阶段惊世骇俗，但社会发展进步后，曾经电光石火的思想不再可怕，同时对现实的关照力逐渐显现，应用价值不断发掘，大众开始受益。与此同时，我们灵魂中那种多数情况下被埋藏起来的美好情感开始发酵，就是自己不能高尚，但向往和推崇高尚，这近乎本能。有了这样的价值判断、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思想家身上的担当与牺牲精神终究被接受，并且是一种不可超越的魅力。同样重要的是，思想家身上高贵品格不难辨认，历史规律表明，思想的道路并不平坦，虽然我们借思想家的思想指引前行，然而产生和坚守思想又是如此艰难，一个个伟大的思想家倒在思想的道路就足以证明。既然思想家成了牺牲的代名词，那么每一个步后尘者必定是品格高尚的人，他们的执著和对真理的向往使他们不惧死亡、直扑死亡。更具悲剧色彩的是，思想家许多情况下不是倒在强权者手中，而是倒在受自己思想关照的广大民众手中。谭嗣同就是这样一位英雄、一位思想家，他是为拯救民众而选择了死亡，然而走向刑场的道路上，迎接的不是景仰，而是辱骂和臭鸡蛋。不管现实世界还是宗教领域，有牺牲就有神圣，有神圣就能产生信仰，而悲剧又更强化信仰。所以，当我们认清思想家只承担责任和痛苦，而无法享有生前荣耀之时，当人们认识到思想家及其思想不再对我们构成威胁，只需尽情享受其思想的大餐时，自然毫无顾忌加以推崇，有时不惜将思想家及其思想推崇至顶礼膜拜的程度。这大概就是孔子被一代代人推向神坛的重要原因。

我们还要承认，不是所有的民族都惧怕思想家及其思想，不是所有社会都致力于消灭思想家及其思想，即使在做同样的事情，也存在方式和程度的差异，这

些都与文化传统和政治结构、权力运行等因素有关。经历过思想启蒙的国家和民族包容度更高，这里的思想家发挥空间就大，而封建意识浓厚的国家和民族包容度差，这里的思想家腾挪空间必然小。欧洲的历史就充分证明这一点，由于有了罗马平民与贵族的斗争导致12铜表法产生出来，社会的宽容度开始扩大。当贵族和牧师组成的利益集团与英国国王签订城下之约，也就是1215年的《大宪章》，从此有了政权的更大宽容，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非其他国家，为什么牛顿和亚当·斯密出在英国而不是其他国家？不能不说与此有关，甚至说旨在消灭资本主义的马克思长期在英国活动，而没有被消灭，也与此有关。诚然，欧洲有过神学一统天下的历史，因此而来的是一个思想家被消灭，但由于有了启蒙运动，再加上法国大革命带来的自由，美国平权运动带来的平等，终于宽容不同观点和学派，由此带来思想家的大量出现。所以说，思想家和思想的生存环境与一个民族是否经历过精神的洗礼关系紧密。

即使封建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和民族，因为人文精神差异而存在着包容度的区别。比如，走过相同的历史阶段，有的民族思想荒芜，几可被忽略，而有的民族则思想灿烂，他们不仅以思想照耀着自己，甚至照耀整个人类前行。可以说，思想巨人出现在哪里，哪里就有优秀的人民。以俄罗斯为例，这个民族曾产生出一大批思想家，尽管统治者不都宽容，但由于受欧洲思想影响巨大，统治者在压制思想时是有所忌讳的。比如，沙皇十分忌恨托尔斯泰，但他并没有借手中权杖消灭托尔斯泰的肉体，相反却感叹“俄国监狱已经容不下托尔斯泰了”。更为可贵的是俄罗斯拥有产生思想家的丰厚土壤，这个土壤是由崇尚思想的国民构成，那里的国民不会随封建统治者跳舞，而是尽力给思想家以呵护，至少是灵魂的抚慰。结果就是俄国在政治最黑暗时期仍然有大量思想家产生出来，同时其思想还拥有广阔的发挥空间。

中国为什么难出思想家？很重要的是中国近现代几乎没有受到过西方社会那样的思想和精神洗礼。中国历史上仅有春秋一个时期创造过思想辉煌，原因在于分裂的中原处于诸侯争霸，谁想成为霸主获得霸权，必须借助思想家的思想，这就具备了包容思想的客观条件，并由此造就了中国历史上难得的思想辉煌。汉代

统一中国后，儒家独大，各种流派逐渐式微。特别是明清时期的文字狱、八股文彻底地把知识阶层的创造力推入绝境。与上面所讲到的规律相一致，中国思想沉寂，除了统治者的强力打压，就是民众缺少人文思想的洗礼，知识阶层被彻底驯化。如此便有了梁启超先生的观点：“中国人缺少高尚之目的”，进一步讲中国知识阶层缺少高尚之目的。知识阶层没有了高尚目的，就缺少了担当精神、牺牲精神，也便不会为思想而冒险。

新中国成立，这原本是中国走向思想辉煌的契机，一段时间里也确实让知识分子确信中国文化和思想繁荣即将到来，而知识分子的兴奋、欢呼与期待，从胡风长诗《时间开始了》可以看出。好景不长，时代局限与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历史转了个弯，让中国文化遭受重创的“文化大革命”发生了，此后很长的时间里中国鲜见思想的光芒。正所谓一着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即使改革开放后“科学的春天”到来，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仍然困顿于精神和思想的樊篱不能自拔，终于只产诠释文章，不产原创思想，更可悲的是自己无法产生思想，只想打压不多的几缕思想。放眼今天的知识界，不敢思想，不会思想，没有独立人格，再加上功利主义，一片沉寂，已经不能承担起创造出支撑一个政党和一个民族崛起的先进理论。这大概是十八大报告，屡屡提及“理论创新”、“勇于创新”的重要原因所在。

思想走多远，一个人、一个集团、一个民族才能走多远。什么在支撑着我们的精神世界，我们依照什么去追求？人们未必都有意识地去思考这样的问题，但当我们回头看自己走过的道路之时，当我们环顾周围之时，难免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个体的人与他人，之所以出现社会价值实现上的差异，很重要的一点便是思想上的差异。可以说，缺少思想光芒映照的人不会走出更远。由单个的人推延至一个政治集团乃至一个民族，道理和规律相同或相似。看一下世界的政党发展史，为什么出现兴衰更替？关键看有没有最先进的思想注入进来，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一个个走向消亡，也是由于僵化而不再拥有先进思想的指引。这方面苏共最为典型。再到大国的崛起，表现形式虽然多样，根本也是看有没有一批思想家以伟大的思想来校正方向。正所谓“一个民族有一些关心天空的人，这

个民族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关心脚下的事情，注定没有未来”。天空是什么？天空是精神，而精神源自思想。

我们已经走出多远和想走多远？回溯历史便十分清楚，中华民族已经走出了很远，并且越是回看感知越多。但是，到了近代以后，中国衰落了，并且是被抛得很远。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一个唯一没有切断文化源流的世界古文化，一个创造过人类辉煌，且雄居世界巅峰的民族，骨子里渗透的、血脉中流淌的都不可能是甘于寂寞，再加上1840年后的百年屈辱，更决定了对再度辉煌的渴望。渴望辉煌自是好事，但需要认清如何满足渴望，找到达成目的途径。毕竟今日之大国崛起不同以往，也就是说铁血不再是样板，创造文明的能力才是唯一正确的途径。换句话说，谁能够立身于人类文明的制高点起引领作用，谁就能够实现真正的崛起，而文明需要思想家及其创造的思想来支持，否则，物质力量或军事力量再强大，都不敢言崛起，尤其是置身于人类历史的长河之中。

既然崛起无法离开思想，那么我们该做些什么来保证更多地产生思想家和思想？首先，执政者更新观念，尽快确立新政治观。科学把握思想对于执政的重要，也就是说不要以消灭异己来保护主流思想，而应当在各种思想的碰撞中获得最先进的思想。社会与自然界规律都已经表明，没有了天敌，没有了威胁也就失去了提升自己的动力。苏共领导人总结失败的教训时讲到，苏共的失败根源于三个垄断：政治垄断、思想垄断、经济垄断。这是很值得思考的。有一个问题需要我们反思，进入新的时代，我们产生了多少为之自豪的思想？！为什么缺少思想？就是因为太强调一致，太热衷于“对表”。其次，努力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或者说提升全民族的人文品质，以提升大众的包容度和理解力，为思想家和思想的生存创造社会条件。再次，知识界、理论界要承担。进入改革开放后，思想理论界都进入了一种躁动状态，没有多少人还能够静下来思考问题。于是文化的泡沫比比皆是。解决知识界的问题，特别需要强化独立人格和独立思维，要有信仰和信念的支撑。

到这里还要结合本书讲几句。思想实际上也有层次之分。一种是原创性思想，这种思想伟大而又宝贵。还有一种思想是为伟大思想的产生奠定直接和间接

的生长基础，换句话说为伟大的思想产生提供土壤。就本集子而言，不属于原创性思想，而是集纳近30年来接受媒体访谈实录，既然是接受媒体采访，就是命题作文，前提决定了不会进行原创，更多的是诠释和解读思想。尽管如此，接受采访毕竟是要表达思想观点和看法，虽不能放飞思想但也要以更深度的思考来赢得受众，所以其中又有思想。回溯近30年与媒体交流，自己一直试图把自己的一些新的思考揉进去，保证有效反映一个理论工作者的不懈努力，期间有赖于记者的大力支持，不仅把已有的思想传播开去，同时还迫使自己不断去进行新的思考，未必不是缘于此，而产生了一些新的认识，这些恰是新思想的难得动力。为此，我想借此向进行过采访的所有记者表达深深的谢意。

一句话，我愿意一直奔跑于思想的原野，直至生命的终结！

2012年11月于北京国防大学

我为什么提出新政治观

自序二

《新政治观：创新点与突破口》一文在《人民论坛》杂志10月号（上）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远出预料之内的反响，尽管该文所涉观点只是我的《新政治观》理论体系中的小部分，尽管编辑部为了避免影响过大而适度降调：原计划该期只做新政治观一个专题，后来搞成两个专题；原计划请多位专家围绕我上一篇文章——《重新诠释政治成当前最重大命题》中的思想点展开讨论，后来不具体挑明策划的思想渊源；原计划发表我的14000字的长文，后来摘发了其中的5000字。即便这样，由于很多人猜测此文乃中共十八大政改风向标，再加上网民和学界高度参与，终于把一篇理论探讨或一个新理论催化成社会热点。在该文处于热烈讨论之时，许多媒体希望我回应，而我因种种原因放弃了，但回答质疑是理论工作者的责任，所以，讨论降温之后，在《思想的原野》出版之时，就为什么提出新政治观，及其网上关切阐明自己的基本观点。

我为什么提出新政治观，或者说该理论形成路径和动因何在？涉及理论自身动因，一言一蔽之，就是将政治引到平衡利益的基本功能上来，就是让政治与时代发展同步，根本目的在于让更能满足共产党执政需要的政治理念、政治行为确

立起来，保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更扎实，执政能力更强。对此，已发表的相关文章已经作了重点阐述，在今后的文章著作中还要作更加深入分析。这里想换个视角，也就是将自己长期开展理论研究的过程和脉络盘托出来，间接说明该理论产生之必要、之必然。

上个世纪80年代，作为士兵的我受诸多因素影响，由文学爱好转到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的道路上来，最初着眼点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和手段，即寻找僵化落后向鲜活生动转变的路径，以此改善思想政治工作者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形象，提升工作效率，后来认识到方法手段改善而来的效力必将穷尽，必须找到突破口。就如上个世纪80年代如火如荼的农村改革，由于捆住农民手脚的绳索解除，生产力迅速释放，经济实现腾飞，农村面貌迅速改变。及至因解放而来的生产力穷尽，农村经济进入较长期的停滞，后来将突破口选在创造生产力。这样的规律和特征反映到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就是尊重群众的主体地位，挖掘和激发其主动性和能动性，成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增长点和突破口，这样我就把通过个人修养提升精神境界，产生精神力量作为自己研究的着眼点和着重点，期间不仅发表一系列相关文章，还围绕“人生十个修养”到各地作报告，直至走上央视。尽管演讲报告备受欢迎，尽管央视播出后获很高收视率，尽管以此内容为核心的《与青年谈人生》出版后获国家图书奖项，我还是很快终止了这方面的工作，原因在于过程中一个问题突出出来。

诚然，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都必须重视并提升人文素养、品德修养，问题在于修养过程中该坚守什么，为什么坚守，怎样坚守，如果走偏怎么办，特别是多元价值观并存的情况下，我们甚至不知道何为最根本的价值追求。疑惑与思考把我的研究引向核心价值观，试图通过价值坐标的确立和恒久性元素的获取，矫正和支撑起我们的品德修养。提出核心价值观的命题应当说是个人理论研究上的一大突破。虽然作为哲学命题，核心价值观很古老，作为企业文化命题，也是改革开放之初就自西方引进，但作为一个政治属性命题，一个囊括了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价值观、中国军人的核心价值观，也就是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精神建设的系统工程提出，这在中国还是首次。至于其中有的研究成

果很快进入决策，就更值得自豪和骄傲。我曾经认定核心价值观将是自己理论研究的归宿。然而，在党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人们逐渐把研究重点转移到核心价值观上来之时，我发现自己的研究遇到瓶颈，因为更深层次且具决定性的命题待解，这就是政治需要重新诠释，新政治观需要确立。

自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至今，已有六年时间，期间理论界一直努力争取突破，也就是产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甚至引起决策层的关注乃至参与，结果仍未如愿。有人认为十八大报告已经解决了这一问题，因为提出了12个概念，其实这仍然是阶段性成果，尚不能确定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核心价值观的基本特征是凝练易记，突出精神元素，具有操作性。很显然，12个概念24个字只能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基础，而不能认定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定意义上，12个概念关照了方方面面，是对基本价值元素的集纳和归类。这一点我们只要比较一下西方的核心价值观就清楚了。西方早期的核心价值观是“自由、平等、博爱”，目前的是“民主、自由、人权”。北欧国家增加了“公正和互助”，如其国会建筑的核心价值观是：“民主、自由、平等、奋进”。以此对照，显然不能说12个概念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什么在核心价值观问题上获得共识那么难？瓶颈何在？表面看是多元价值观并存致使难以达成共识，其实更主要的还是社会主义自身内含外延尚未获理论突破，高度依附社会主义本体理论的核心价值观自难产生。甚至还可以说，究竟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哪个更能实现“建设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的目标，都有研究的空间和余地。一切的一切，都决定于我们对政治的诠释，或曰新政治观能否产生出来。不能对变化了的世界政治生态作出准确判断，不能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特质，就不可能产生科学恒久的核心价值观。这就是我由核心价值观研究转到新政治观研究的主要原因。当然，真正开展新政治观研究后，发现其关照范围更宽阔，意义更重大，核心价值观已经降至其内容之一，甚至不是决定性内容。完全可以说，新政治观直接决定的是中国共产党能不能实现第三次飞跃，十八大报告明确的政治体制改革将走向哪里和走多远，中华民族是否真正实现伟大复兴。

为了阐明新政治观具有广泛关照力，这里仅就中华民族道德建设作出分析。当代人最焦虑的问题之一是社会公德不彰，为什么一个重道德甚至依靠伦理道德维系政权与社会的国家和民族，道德建设如此艰难？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由农业经济基础上的熟人道德进入工业文明、信息文明下的陌生人道德，却尚未实现有效转换；其次，儒家伦理下的重私德到市场经济下的重公德，尚未实现新的平衡；再次，善和道德莫基于宗教，我们试图摆脱宗教而以政治来推动，却尚未有效诠释和畅通路径，等等。尤其是以功利的政治解释无功利的道德和善，其间有哪些问题需要处理，以免发生冲突？我们研究得还很不够，需要开展的工作更多，问题是表面现象背后涉及的是对政治的重新认识，也就是新政治观的支持。否则，政治越发力，越是无法接近所期望的道德。

换个视角分析，党风决定政风，政风影响民风，一个社会的道德状态很大程度上受党、政府内成员的道德水准的影响。现实看存在着官员追求道德的动力不足，且进步艰难，除了官场本不是张扬道德的空间，更因为我们的制度设计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官员的道德追求。比如，每一个步入官场的人，都追求更大更充分的价值实现，这就难免竞争，而竞争最关涉道德观念与道德行为，如果制度设计科学，道德就得到维护，否则会抑制甚至扭曲道德。也就是阳光下的竞争可以维护道德，潜规则下的竞争直接弱化乃至扭曲道德。我们虽然也强调“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但倡导与实际还有很大的差距。当一个人在竞争中的胜出多数情况下必须求助于潜规则之时，你就不要希冀道德得到遵循和张扬。那么，是中国共产党不希望自己的成员成为社会的道德楷模？肯定不是，党希望集团内的成员道德高尚，以此保证党的纯洁，保证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戴，问题是我们更强调政治需要，政治集团强调政治需要合乎逻辑，问题在于政治存在着如何解读和诠释的问题，而不同解读和诠释得出的结论迥然不同。比如，选“党放心的人”最后异化为少部分人选少部分人，甚至出现“马德案”中的情况：“我想提谁还能提不了吗！”到这时情况就很危险了，因为打着党的旗号售私，比公开买卖官对道德的伤害更大且深远。为什么马德领导下的绥化市所有处级以上干部皆向其行贿？道理即在于此。不给竞选者以公开表达理念以获得支持的做法，那么选择恰是扭曲

道德和价值观，甚至胜出者也不会因此而得来道德感。当我们把民主选举过程中的赢取支持的活动都视作“非组织行为”后，就等于剥夺了以公开表达理念获得拥护者的权利，这时要么保持道德高尚而坐视别人拉票，要么放弃操守进行私下拉票，二者必选其一。不管答案多么的无奈和痛苦，我们都必须承认，仅仅通过信仰和党的性质宗旨来提升集团内成员的道德水平，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下来的只能是通过改善体制机制维护政治活动中的基础道德。政治有特有的伦理道德，以近乎宗教性质的道德标准去评价内含着利益的政治集团，是虚幻的，以社会公众的道德去评价和规范官员的行为，也不会把官员引入正确的方向上来。这也是新政治努力解决的。诸如此类，都是鲜活的现实存在，并且随着研究的深入，其空间和内容一定会有新的拓展。

有了上述介绍，这里再就新政治观发表后的各方关切作出部分解答。历史证明，一种新的思想或理论产生出来后，引起关注乃至置疑实属正常，只有惊诧和置疑过后，经过思考和回味，才可能品出其间的滋味。

一、“为谁说话”与强调理论准备不足的目的

在过去不太长的时间里，郑州那位副局长一句“你是为党说话还是为老百姓说话”的质问，引来网民一面倒的讨伐。这充分说明，人们都不希望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的依存关系发生蜕变——由利益共同体异化为利益对立体。倘真这样，必是国家和民族的灾难。

想不到新政治观发表后，仍有不少网友质问我是否为共产党辩护和开脱，还是为老百姓的诉求说话。如果强调的是理论工作者的品格和责任，那么唯一标准就是真理。如果就事论事，网友的问题也不难回答，作为体制内的理论工作者，必须站在党的立场上，并且内含着为人民群众的诉求说话，因为在我的精神世界和价值坐标中，党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我研究的理论就是强化这种一致性和不可分隔性。

即使纯粹从社会角色分析问题，作为人民中的一分子，同时自己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就意味着价值观、政治观与共产党一致。如果身在党内心在党外，以反对共产党来体现自己的人民性，政治品格已经出了问题，久而久之还会因灵与肉

的背离导致双重人格。即便党的成员有不少因精神蜕变与人民利益发生冲突，我们也需要理性和辨证，不能因为大树底下有枯枝败叶就想把大树锯掉，不能因为水是脏的就把孩子一起泼掉。否则只能导入非破坏而不足以建立，非摧毁而不足以获新生的逻辑与轮回。倘是如此，对国家和民族注定是灾难，对每个人同样不是福音。

至于文中提出理论准备不足制约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观点，许多网友认定此乃为政改迟缓开脱，这种判断属于没有认真阅读文章，更多的是受标题党的影响。该文立意其实比政治体制改革更宽泛和高远，因为文章探究的是根本理论的突破，通过理论突破推动国家和民族实现第三次飞跃。既然讨论的焦点已经变异，既然这种变异中又折射出社会脉动，那么我们便不再局限于文章本身，而是随讨论焦点的变化而改变，也就是把重点放到政治体制改革上来。

我强调理论准备不足的目的是什么，诉求何在？其实很简单，理论不足就要找到制约理论发展的原因，就要消除制约理论发展的因素，保证创新、发展和完善理论。其间最关键的是执政党要有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更大的包容度，以实质性的措施支持引导理论创新发展，必要情况下开展争论。

谈及理论上的争论，难免涉及当年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他提出了一个“不争论”的著名思想，其实这种选择是不得已而为之，知道先有理论走得更稳，更少走弯路，却选择了不争论，就是因为当时缺少争论的社会基础，属于特殊时期的特殊办法。上个世纪60年代初的中苏论战，有人讲论战的结果迟滞苏联改革数十年，为什么，当时中国遵循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而苏联想突破这一理论，又不敢公开说，这样社会主义阵营开会时中共代表团引经据典，慷慨激昂，而苏共代表团只能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中找出只言片语，疲态弱势尽显。改革开放之初的情况与此相近，走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但更主要的还是发展和突破，在大众包括党内高层尚存在更新观念的情况下，是不能进行讨论的，只能先干后总结，让事实说话。

这里特别强调的是，在有了30年发展成就与实践经验的情况下，我们社会已经拥有了比较强的讨论甚至争论的基础，也就是说，今天不仅不能限制争论，并

且应当鼓励和支持争论，通过争论寻找前进的路径和方法，尤其是通过争论达成共识，这是政治体制改革不可或缺的过程和组成部分。看一下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为什么激发了人民如此昂扬的精神风貌？就是因为全社会直接或间接参与其中。今天，中国在精神疲软的情况下，要焕发昂扬的精神，执政党必须主动开展一次新的大讨论，唯此才敢言民族的精神崛起，才敢言物质成果得到巩固。

二、导致理论准备不足的基本原因是什么

有网友质问，新中国成立已有60多年，改革开放也有30多年，为什么仍然出现了理论准备不足的问题？这种情况是不是一直持续下去？可以肯定，理论不足的问题必须解决，否则中国就无法前行。至于导致理论滞后或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世界和中国社会发展太快，新生事物太多，就如乘坐在火车里，刚看清眼前景色就被新图景所替代。比如，中国的经济总量排序快速提升，由受援助人，由跟着他人制订的规则跳舞到参与规则制订，仅仅30年。当然，最重要的还在于世界政治生态变化带来的影响，因为由此而来的是新的博弈规则的形成。尤其重要的是，如果政治生态变化是两种制度趋同，就太简单不过了，问题是现阶段世界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倾斜，当僵化的老路走不通，西方的道路也不接受，那么创造新理论走出新途径就是唯一选择。这原本就不是容易做到的。

其二，理论工作者的创新思维与创新能力偏弱，尤其缺乏敢于为真理献身的勇气，制约了重大创新理论成果的产生。两年前我曾在《中国青年报》发文，提出中国为什么难出思想家的命题，在种种原因中有梁启超所归结的“中国人缺少高尚之目的”。理论工作者原本走在社会的前列，其存在天然的风险，没有担当和牺牲精神，就只能解读和诠释。实际上，党和社会的宽容度比理论工作者的理解程度要高得多，近年来我给中央、军委总部上报内参、研究报告80余份，这些报告很多是对现行做法的质疑，我的演讲报告也有上千场，报告中有很多对现实的批评，过程中感受到的不是限制，关键在于有没有真知灼见，是否在向真理迈进。

其三，社会大众除自身参与不够外，尤其没有承担起为大思想、大理论的产